
演 講

歷史圈套與文化困境—— 中西對話之下對「中國婦女」的建構^{*}

葉 文 心^{**}

有關中國婦女的各項學術性議題，在過去二十幾年之中，逐漸發展而成為顯學。這個現象的產生，反映了多層的因素。簡單地說，所謂「中國婦女」包含兩個成份：「中國」以及「婦女」。作為一個「中國」話題，這是一個介乎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跨文化論述。作為一個「婦女」話題，這是中國文化社會近代轉型及革命史中的一章。也正因為所謂「中國婦女」並不是一個在具體時空架構之中的自然存在實體，在建構的過程中經歷了多重中介，所以從學術或文化史的角度來觀察，有關「中國婦女」的各項論述，也就可以看作是各種流變的多元窗口，值得我們反思與細究。

我們知道，八〇年代初期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在經過三十年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之後，邁出步子走向市場機制及私有化的道路。與此

* 本文係「近代中國的婦女、國家與社會（1600-1952）」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2001年8月23-25日）的主題演講。

** 柏克萊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

同時，娼妓的現象重現在中國的街頭，有關男女性別歧異的話題取代了有關「人民內部矛盾」的階級分殊，成為人與人之間等同區分的新議題。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全國婦聯在大陸各地成立分支機構及研究定點，一方面為婦女權利進行申訴，一方面收集資料成立檔案以便全面反映婦女在中國的各種狀況。八〇年代大陸的文壇上更崛起了一批女作家，將社會主義紅旗之下的兩性愛情、婚姻、離婚等關係作了前所未有的表述及描繪。這一抹「桑青桃紅」一反以往的藍灰一片，引起了中外學者尤其是西歐、北美學者的注意。影響所及，有關中國婦女的種種成為跨越太平洋的話題，婦女研究也就成為中國文化歷史領域中的新興主題。

這個跨國及跨文化的對話，總體說來，其中最具深意的，是包含了兩種議題的認知及立場。自從大陸經濟開放市場機制化以來，西方尤其是英美主流媒體中所常作的報導，不乏有關中國農村婦女被拐騙綁架淪為娼妓，大批女嬰女童被父母家長遺棄殺害等等的驚人揭露。國際銀幕上的得獎大片，更包含大紅燈籠高掛之下三妻四妾、鴉片畸戀等等所謂封建舊中國慣常運作下無可避免的內幕。這些報導及描繪所著眼的不只是婦女地位的低落，也是人權的泯滅，其中所刻劃的現象自然不全屬子虛烏有。但是在畫龍點睛之餘，所突顯的往往是中國與西方的對比，或者是傳統農村社會的禁錮束縛及現代都會文明的自由開明所形成的截然區分。

許多學者對於傳播媒體中這樣的人我對立或者是以西方經驗為本位的著眼固然不能苟同，然而對於人身獨立、人權自主的價值觀卻不能不作某種程度的認同。這種認同表現在婦女問題的研究上，往往形成一種對性別等差歧異的關注，以及對於平等解放的希冀。以此標的反觀中國社會及歷史中的婦女，在這個以個人意識或自我發展為前題的思維指導之下，許多研究設計常把眼光投注在女性對於自主性的覺悟或尋求上。這樣的中國婦女研究，並不滿足於把「婦女」作為研究題材或對象，從而進行一種外緣的、客體的描述。這些知識活動所更積極探索的，是女性主體性的問題，也就是一種以「女性」為文化敘述主體的建構，或一種由內而外的主體塑造及社會文化反抗。從這個角度著手中國婦女的歷史研究，則難免得到一

個結論，即中國婦女一貫缺乏以女性自身為主體的發言立場，也缺乏自本位出發的話語傳統。無論是「傳統」、「封建」或其他因素使然，她們是默而無聲的一群，有待發聲振曠的靈光展現以便進入真正的存在。

以「平等」、「自主」為著眼點，然而運用在歷史文化研究上便難免牽涉到一個形而上的問題，也就是關於主體建構與歷史經驗之間關係的問題。我們知道，傳統中國倫理思想中的人際關係，所強調的是人與人之間相對的仁與恕，而不是個人的絕對權利。儒家詞彙中的女性描述多半是基於「人妻」、「人母」、「人子」等關係的倫常界定，而少見以性別為首要的絕對分類。中國婦女的主體建構，跟中國的歷史、國家、社會或文化便無可避免地有相當關聯。中國女性的「平等」或「自主」，未必與西方經驗或認知同步。中國女性或任何女性的自我意識及社會要求，在不同的時間及空間背景之下，也必需具體實現在不同的內涵或社會意義上。

八〇年代以來，大陸的一些女性學者對這一類問題進行思索。她們的研究命題或多或少具備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本位觀點相互抗衡的成份。這些學者認為有關中國婦女研究議題的開展，不能漠視 1949 年以來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社會主義旗幟下所採行的若干國家政策與社會變革。簡單地說，西式資本主義商業社會中，婦女所身處的是個性別不平等的等差格局。這個等差格局也是一個男女性徵高度差別發展的格局。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政權的統治之下，則是另外一番局面。因為國家政策的緣故，中國婦女在政策對待中取得了和男性平等的地位。但是這個男女平等，卻建立在一個消弭性別差異的前題上，也就是把女子和男子等位齊觀，一律以男子為準，把性別差異發展減到最低。在這樣的體制下，無論男女都以男子為典範，女性無法另立格局，建構性別差異與個性。然則中國大陸地區婦女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西式的男女不平等，不是「資本主義少奶奶」的花枝招展，因為這種資本主義消費社會裏的性別順位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並不存在。社會主義生活中婦女們所面臨的，反而是兩性在性別分殊上的缺乏充份發揮，是「共產主義老太太」的清規戒律。六、七〇年代婦女們被捧上「半邊天」，但是這是駕駛拖拉機的婦女，不是綁著辮子的大姑娘。總之，社會主義之下男女算是平等

了，但是女性不能自我實踐為充分的女人，而老是被看待成和男性在表面上平等的次種男人。

這個看法究竟有多少根據？我們不妨回顧一下 20 世紀以來的中國近代史。我們知道，在大陸正統的中國近現代史敘述中，五四運動是跟社會主義革命史緊密銜接的。五四運動新文化對舊文化的挑戰，首先在於對傳統儒家倫理的批判。新文化的知識份子不但反對尊君、尊孔這一套政治倫理，五四社會思潮中並且對所謂奴隸的道德，也就是以節與孝為主的三從四德、孝子賢孫這套典範大作攻擊。毛澤東在 1920 年代還在湖南的時候，就指出壓在中國婦女身上的有好幾座大山。這些大山包括神權、族權及夫權。北伐前期國共合作期間，保守派把革命婦女組織的口號及作為歸納成「打倒親丈夫、擁護野男人」。這個「野男人」主義不久就成為保守力量打擊新文化及社會改革思潮所引燃的進襲火線。三〇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勢力被逼出大城，進入內地鄉間大山，以後長征，更進入到西北及少數民族地區。不少學者指出這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為了得到農民的支持，不得不在社會政策上妥協，犧牲了不少婦女的權益。然而 1949 年之後，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國民政府若干法制的基礎上，進一步立法廢止多妻、納妾、買賣婦女為婢妾等千年舊習，在國民政府及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法規之中，婚姻的進行都必須得到當事者雙方的同意。婦女有權可以聲請離婚、擁有財產、取得繼承權。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立法上更保障婦女在工作上得到平等待遇、同工同酬。五〇年代中期以後為了婦女就業，還有其他措施，城市婦女托兒、產假等都以立法手段逐步實現。墮胎、避孕等醫療制度初步建立，相關知識有計畫地傳播推展。後者擴大了婦女對生育決定的參與，意義尤其重大。

然而傳統男女關係的大幅調整，不少大陸學者相信是發生在五〇年代的中期以後，尤其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集體化積極進展之後。五〇年代大陸農村由合作而集體而人民公社，成千上百萬的農村婦女一反傳統的家庭勞作而成為生產小隊、生產大隊的成員。許多鄉鎮婦女也進入家庭之外的勞動隊伍。大躍進及人民公社時期，大家就食於公社的食堂。婦女所從事的勞務即使仍不外膳食、育兒、清潔等，這些工作的進行因為在家庭的制約

之外，所提供的對象不再是丈夫、婆婆或其他家族成員，而是擴而充之，面對一個較大的社會圈，這些勞務所服從的不再是三、四人的喜怒，而是集體的制約及評估。這個改變的意義未必在於工作負擔的減輕或工作條件的改善，更未必關乎個人身心的發展或視野的擴大。然而饒有意義的是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農村婦女因為集體化的結果，一年之中有一半的時間得以在家庭的範疇之外從事勞務。這些婦女們因此得以擴大例行的交往圈子，她們的權利義務以及作息時間、活動空間的支配，因此不僅服從於家庭需求的制約，更介入了公眾生活的軌律。不少大陸學者認為，這些由於國家政策使然所造就的性別形象有助於婦女的社會參與，也為婦女們打下了在鄉鎮街道等基層組織擔任公職的基礎。

集體化國家政策雖然有助改善農村中國婦女的處境，但是細究起來，並不無可以非議之處。集體化計畫經濟固然將婦女進一步包容在家庭以外的勞務過程之中，但是這個轉變的目的並不在於調整兩性之間的地位與關係。政府從國家利益著眼，制定政策，各種舉措並不著意於保障「弱勢團體」，在多半情況之下，權衡輕重，往往遷就既成形勢，並不以改變性別順位為目的，大躍進之後接著是「三年艱困」，在這個空前糧荒的情況之下，被犧牲者的年齡及性別比例是個很可考究的問題。以後以國家的力量強制實行一家一胎的人口管制政策，更是直接以強勢手段干預婦女對生育問題的決定。無論過去數十年的共產主義是否給婦女帶來形式上的平等，八〇年代計畫經濟向市場化及企業化轉型之後，婦女的地位與待遇又出現了新的變化，對於「中國婦女」論述發展的意義，在於兩個層次。

其一是空間秩序重新調整，區域性差別及城鄉之間的間距加大。沿海大城市國際化，一些中、西部內地婦女離鄉進入大城尋找就業機會，大城市之中的中上層人口則流出國境，成為跨國的一群。

其二是意識形態陣容的重組，以及其中所帶來的「穿衣鏡效果」，也就是當東、西兩陣營相互凝視的時候，往往因為雙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逆反，而產生彼此所見影像左右錯置的效應：以左之左為右之右。這個現象的產生又與大陸改革開放以後對社會主義話語歷史的重估轉換相關。

八〇年代大陸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著有績效的是農村集體化的結束，以及鄉鎮企業的發展。這一段以農產加工導致農村轉型的經驗，與六〇年代臺灣農村的轉型有不謀而合之處。壯年男子離村就業於產業或建築工地之後，農村勞動的主要負擔便落在婦女身上。婦女們在男子離家之際成為一家之主。農業勞作的生產者也同時產生了女性化的現象。

在這個潮流之中，未婚的年輕女子紛紛加入離村的勞動隊伍。大陸東南沿海的經濟特區工廠中僱用了大批青年女子。上海外圍長江下游的農村由於工業企業化走在全國其他地區之先，這裏的青年男子遠征港、澳、日本、澳洲，留村的女子便成為鄉鎮企業工業化的主要生產勞力，無論是東南沿海或長江下游，這些經濟的活躍及人口的流動情況跟華北及中西部農村形成對比。前者是開放型經濟，機會增多，婦女們在勞力市場的環節上向前跨了一步，取代了離鄉男子原本在當地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後者則在集體化結束之後，男子們依然留村從事勞務，女子們回流到家庭及廚房，走回集體化之前的道路，重新回歸到夫權的統馭之下。九〇年代中期之後，經濟體制改革的運作深化，北京近郊城鎮出現家庭式機器輕型製造業，婦女從事生產，男子幫助行銷，女子地位提高。山西、陝北等貧瘠地區則一如往昔，農民困守家園。

從這個簡單的輪廓可以看出來，以大陸幅員之廣大，幾十年來各地變化之複雜，經濟轉型對各地「中國婦女」的影響並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的。八〇年代以後，官方在意識形態上對貧富懸殊之類階層性的問題略而不談，然而自從珠江三角洲地區越過全國其他地方「先走一步」以來，大陸各地地區性差距日益顯著，城鄉間隔日益分明。今天的「中國婦女」既生活在北京、上海等國際化日深的通都大邑，也處身在廣西、河南等貧困落後地區。經濟體制轉型對「中國婦女」的影響是多元多面的。簡單地說，過去一、二十年以來，地緣的因素取代了歷史因素、空間聯繫橫向的網絡取代了時間累積縱向的傳承，成為組織經驗決定處境的重要座標。所謂「中國婦女」不再單純是由中國歷史或文化社會倫理塑造凝聚出來的、具有高度共性的整體。在各種市場機制、經濟力量交互運作之餘，「中國婦女」

解構為「都市婦女」、「農村婦女」、「上海寶貝」、「山東姑娘」等等，林林總總如八仙之過海，各自掌握運作機緣，面臨不同處境。

以北京或上海為例，婦聯調查報告反映，許多父母認為生兒生女一樣好，甚至有人以為生女甚於生男，因為女兒比兒子細心，懂得照應父母。許多年輕夫妻願意跟丈人住得近，這是因為退休下崗的丈母娘可以幫著照應家務，跟女兒也不致於有婆媳間的衝突。小家庭既有兩個工作單位，住房、醫療等各有貢獻，夫妻之間在重大財務上的決定可以共同商議，並且共同分擔照應子女的責任，許多年輕一代的丈夫負責接送幼兒園、幫助家庭雜務。學歷越高的夫妻分工合作的情況越普遍。此外，通過國家立法，許多企業及單位、機關附設托兒設施，並且規定有產假。換言之，改革開放的新紀元同時關注到婦女的權益。沿海大城中上層婦女的生活與西方小家庭無異。

然而婦聯調查報告也顯示，有三分之一出生在五〇及六〇年代的中國女子是文盲，文革以後失去求學機會，八〇年代以來無法透過新的經濟機會來改善她們的情況。集體生產的解散意味著她們回歸到夫家的掌握之下，成為家庭暴力或地方幹部濫權的受害人。有些統計顯示，這樣的女子即使想成為娼妓也似乎不得其門。大城裏的娼妓往往來自中小型市鎮，並且受過一些中小學教育，懂得如何離鄉自立門戶。從這個角度來看，經濟市場化放鬆了國家的掌控機制，同時也加大了經濟因素及舊式男權的運作空間。在這個新秩序未上軌道的時刻，有一批女性因為缺乏保護自己的能力，而重新成為受害人。

這個受害女性的形象，是個「古已有之」，不難想像的形象。這是西方傳教士筆下，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已經刻劃了百餘年的古老中國數千年不變的閉鎖落後景象，也是當年中國共產黨承繼新文化思潮，社會革命所宣言要改造的對象。這類女性即使不是全然默而無聲，也多半是被刻劃、描述的敘述客體。由於機緣及學識的限制，這一類的女子在經濟力量及市場軌則的運作下不得進入國家政策受惠之列。然而這一類的婦女形象卻不是近年學術研究關切的主要對象。

八〇年代以來，有關中國近代婦女史的研究，學者們一反以往對剝削壓迫、貞節牌坊等等的關注及強調，而將眼光轉向女子參政、教育、就業等婦女參與現代化及都市化的議題。許多中外學者撰文考究晚清以降、西潮衝激之下，中國的女學如何興起、女報如何流傳、女子如何介入公眾事務的討論、組織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其中種種，不乏清末開明紳商的參與。這可見源自中國的傳統在某種程度上也有推進改造文明的能力。

這個「後革命」或是「非革命」的文化史，同時伴隨著「後殖民」或「非殖民」的中國觀，一方面對西方殖民話語進行抵制，一方面對中國歷史文化資源進行重組。在有關婦女議題中最可見微知著的論述，無過於對晚清以降、民國時期上海地區資產或中產階層都市小家庭的研究。這些中產階層的婦女們既具學識又具資產，都市新興的小家庭既是她們的堡壘又是她們的天下。這些女子裝飾合宜，穿著入時，是都市消費文明的中流砥柱。她們的婚姻是戀愛及自擇的結果。她們的兒女是關愛保育的對象。小家庭的生活上不受公婆牽制左右，下不受大家庭妯娌親戚的繫絆。她們的生活之中既有責任又有自主，既有忙碌也有閒暇。閒來無事這批女子出現於公眾空間，既是戲園的觀眾，又是百貨商場的主顧。她們的出現營構了一個新式女性化的公眾空間。她們的生活既充滿女性意味又得以免於傳統婦女的約束禁錮。

20世紀前半期都市婦女的生活中自然有黑暗面。大家只要對西方婦女史稍作涉獵，都能想像三〇年代資產階級都市家庭婦女的生活，與九〇年代懷舊者以特別眼光所尋求的世界大有不同。三〇年代家庭婦女的形象與當時商業廣告的塑造不無關係。所構築的形象婉約賢淑幹練，正因為女子們理當如菟蘿之附女蘿，依傍在以男性為中心的近代化都市文化之中。五四以來即使是以婦女解放為主題的議論，常常也發自男人。民國時期文明人物離婚另娶引述的理由之一，是舊式婦人識字不多，見地不廣，不能在新潮文明之中幫助丈夫應酬持家教育子女。文明女子得自上海名校的大學文憑，有時被譏為一紙新式嫁妝。然而近年在「中國現代化」主題籠罩之下的婦女史，則把描繪的重點放在都市婦女家庭生活的閒適安逸上。這種

對個人空間及家庭清靜的嚮往，凡是到過大陸，見過黃昏公園裏木椅或草地上情侶的人都能心領神會。但是九〇年代這種對貌似資產階級小布爾喬亞生活的認可，未必出於保守心態。這是個源自歷史的反面文章，我們只要回顧民國以來的文化政治史便可以了然。

我們知道，三〇年代中期世界不景氣潮流來到中國以後，當時國內輿論界裏浮現了一股左派思潮，直截了當地認為資產階級西式的都市小家庭在次殖民地的中國是沒有存在的條件的。這些小家庭既不能逃過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的陰影，更避不開西方帝國主義經濟剝削的效應。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遵守這個古訓，任何家庭的成員都應當首先放下一己的瞻前顧後，捨去眼前的算計，加入民族解放、國家生存的奮鬥行列。以當時的形勢而言，這番思潮所指，也就是國難當頭的中國人不分男女都應該走共產黨領導的路線，以達到集體救亡的目的。資產階層的婦女也不例外，應當獨立於家庭，取得自立的能力，參加為國家民族奮鬥的行列。

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之下，四〇年代的婦女造型乃呈現兩種典型。其中凡是燙髮、裝飾、高跟鞋、長旗袍的消費型女子與漢奸、投機商人、腐敗官吏或保守反動勢力同列。而凡是短髮、布鞋、不加修飾、粗服的女子則是女戰士或革命者，只有大公無私的愛國情懷而沒有兒女情長的個人生活。三〇年代「老上海」的報章、廣告中，多見充滿女性意味的資產階層女子，四〇年代抗戰之後的電影宣傳中，正面人物則只見不分雌雄的花木蘭。四〇年代婦女運動者的口號，是把鬥爭的矛頭指向入侵的日本帝國主義者，而不指向「與我們同命的男人」。男女在抗日愛國陣線上消弭了同異，達到了並肩作戰的平等。這個平等是為了挽救危亡，是在一個軍事革命形勢的指導之下完成的。男女之間相對地位的調整既附庸在民族國家存亡危急徹底改造的動員下，婦女問題自女性本身的視角加以闡釋，其不得發揮，則是不待多贅的。

九〇年代以來，上海一片憶舊情懷，三〇年代都市家庭婦女的形象及生活一一復現於紙上。纖巧、細膩、精緻、典雅等等再度成為消費文化中的時尚。這些特質正是當年社會主義革命所標榜的對立面。然而經歷過其

後五、六十年的歷史，反觀戰前的歲月，那個資產階層生活形態中似乎不乏個人抒解的空間及直感的悅樂。這和其後紅旗之下一切存在空間的泛政治化及沈重歷史包袱，成為鮮明對比。九〇年代文藝學術界對資產階層都市家庭婦女生活的正面刻劃，從這個角度看來，無疑隱含著一種對大型意識形態的淡漠。這個淡漠的意義可大可小，可進可退。從經濟現代化的角度來看，重構戰前的文化史可以為後社會主義都市消費文化取得歷史及文化資源的支撐。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以都市婦女為主的敘述可以建構一種以女性為中心的社會形態，其中的思維及行為一方面是物質的、經驗的，一方面是著眼在此時此地、人與人之間的。這些重點所不言而喻的，是對宏觀大歷史的冷淡、意識形態大型構築的沈默，以及由此衍生，對大社會、大敘述的退卻，對總動員、積極運動的倦怠。而這些退卻與倦怠的背面，則是一種以女性為主體的另類社會空間及生活秩序的建構，這個建構又代表了一種對以陽為綱之構架的無言抗拒。

這些三〇年代小布爾喬亞男女關係中的保守成份，並不是九〇年代大陸懷舊者有意悉心詳究的。然而這並不表示今人對小資產階級的保守性毫無所悉。對於在社會主義政治教育之下成長的人來說，對於資產階級文化的反面評價，早已是耳熟能詳的陳腔濫調，了無新意。尤有甚者，當年這些來自左派的言論，經過三〇年代以後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經驗顯示，政治運動及文化批判並沒有帶來預期的解放。新中國成立之後三、四十年間屢次政治運動的結果，反而是一種「告別革命」的決絕，以及對高調鬥爭手段的倦怠。從中國近代歷史內緣的演繹來看，「運動」、「組織」、「抗爭」、「批判」等等都是已經被熟加運作、結果了無新意的方式，自五四以來，並且已有好幾代人為此付出過極高的代價。這部社會革命史最後所不能不作的總結，是革命對抗手段未必是達到革命理想、實現解放最佳的手段。九〇年代大陸一些女性學者沈潛鑽研，在個人生活的秩序及工作範疇裏自築價值體系，由近及遠，不假外緣以求變化內蘊，並且以內涵的積累抗疏外力，這種反面文章的正面含義，是必須放在社會主義革命史的大框架裏才能充分體現出來的。也正因為在婦女問題上，這部革命大歷史已

將抗爭手段用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所以恬淡靜默反而一反歷史慣例，不失另闢蹊徑。女性尋求自我實現，不但另構女性化的空間，並且以贊許代批判，以退卻為前進。這是從社會主義革命史的內緣發展來看，今天談中國婦女問題，在話語邏輯的歷史結構主導下，為什麼捨此之外別無立場？或者說，在這套革命話語運作歷史的籠罩下，捨此之外別無立場。

在 20 世紀末葉、21 世紀之初作個中國女人，自然不乏可慶幸之處。我們只要想想梁其姿對清末士紳之家寡婦節婦堂規所作的描述，顯示節婦生活豈只是幽居在深宅重閨，平日不隨便跨出一步或接見一人，而且更是嚴守男女界線，即使是兒子，滿了 13 歲便只許在內院的中庭中隔著距離跟母親談話。這套堂規據說旨在保護年輕喪夫的女子，不致於在不得本人同意的情況下被綁劫販賣到新的婚姻關係中。這項顧慮在清末太平天國戰亂之餘由於人口中兩性分配不成比例，尤有存在的必要。堂規的存在乃為女性自身的保護，然而這套規矩背後所反應的社會軌則及狀況則不由教我們這些生在百餘年之後的中國女子一面為自己慶幸；一面為我們的曾祖母們抱不平。

從我們的曾祖母到今天，中國婦女的生活環境無疑是有了大幅改變。20 世紀以來女子是跨出了深閨，走進了公眾空間。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沿海通商口岸的都市，不但是中外雜處，而且女子出現在公眾場所，中國經濟及教育的近代化，包容了女子在知識及職業領域的參與，也吸收了鄉鎮女子進入工廠、加入機械生產的行列。三〇年代的上海女子除了出現在聲歌娛樂百貨消費場所之外，也有若干具有高深學歷的成為作家、畫家、音樂家、醫師、護士、律師、教師或教授。我們母親這一輩女作家輩出。北伐前夕中國國民黨婦女部及農民部在南方及華中所動員組織的各地婦女不下一百六十萬人。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成千上萬的婦女不但透過婦聯會、基督教女青年會、紅十字會之流的組織支援抗戰，更有人加入女兵的隊伍走上前線。這些革命、抗戰的參與以及其他救災、救亡的努力一方面培養了一批女界的社群領袖人物，一方面也造就了一幫黨工幹事。五〇年代以後農村集體化、組織公社，更進一步把千萬農村婦女引出家庭。九〇年代

跨國交流的發展，更意味著北京、上海之外中國婦女的行跡遠及海外。

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後二十多年的今天，在企業家被納進中國共產黨之際，近來有些人喜歡說：「女人也有一片天地，作個女人，真好！」然而今天在廣義大中國的傳統之下作個女人，果然是「舒展自如，怡然真好」嗎？許多中國男人並不否認，在中國還是作個男人好。這並不意味男人對女人進行宰制與剝削，也不表示女人便必然全無盡情發揮或自我實現的餘地，即使在中古，中國女人善自操作，也可以成為武則天。「君似朝陽、妾似傾陽藿」的向日葵風格今天看來古典情趣也許超過了現實典範作用，但是這並不改變一個歷史及文化傳承下來的基本結構，也就是萬物是繞著太陽而不是圍著月亮打轉的。女性在原本不為她所設計的世界裏，所承受的負擔往往有源自形而上的分殊。這個分殊包括時間經歷上的支離、空間過渡上的割裂，敘述話語之中的滯塞，以及在主體建構過程中逆反文化資源時所必須付出的精力與代價。撇開主體性的問題不談，其他諸如男女同工不同酬、性道德的二元規範、傳統觀念有形或無形的制約，以及由生理差異、心理需要所衍生出來的種種性別歧異及等差對待等仍然所在多有。

比如說，家家戶戶雖然都以女人主廚，但是大飯店裡的大師傅卻幾乎清一色是男人的天下。這並不表示女人不懂得烹調，而表示女人即使在廚房裡也被視為不懂得組織管理、統御應對。我們家幫我整頓內務的是一位來自廣州附近的小學畢業生，平日有她的工作，先生是飯館大廚。大廚下班或休假在家的時間卻從不下廚，總是由太太弄些普通東西。這顯然不是因為先生不懂得在廚房裡如何行動，而是表示家庭烹調所關係的不只是食物的處理，而且更牽涉到閒暇時間的支配及人與人之間的主從服侍問題。又比如說大家庭之中父母在飯桌上對子女的待遇，往往期待男孩子吃得多些、吃得好些，女孩子則吃得少些、吃得差一點，或者是即使如此，算不得問題。這在平日自然不足為慮，在戰爭或荒年的時代便可以造成不小的差距。

九〇年代，北京、上海高學歷夫妻小家庭裏的分工合作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便是在內地農村仍有千百萬婦女和她們的祖母、曾祖母當年一般，受制約於男權以及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制度之下。少數女子得以雲遊四

海、追求所愛，得以完成自我舒展與實現，但是這並不能改變若干結構性在男女相對待遇上的偏差，以及大多數婦女繼續感受到的壓抑與不平。

然則在今天的中國作個女人，果然如西方主流媒體所描繪的那樣危機四伏，人權毫無保障嗎？果然一如纏足納妾之野蠻粗糙，毫無光明面可言嗎？我們自東西文化對話的話語邏輯及其歷史來看，從民族立場出發，似乎無法加以同意，從而認定作個中國女人實在不幸的餘地。換言之，在「中國」與西方交織在一個二元對峙的文化比照的形勢之下，「作個女人，真好！」似乎是中國婦女在殖民主義話語籠罩之下搶抓主動唯一可取的立場。

然則今天當人們在話語運作中堅持中國婦女的處境「真好」，她們所面對的未必是中國婦女，而是社會主義革命史及西方殖民主義的霸權話語。也就是說，在這兩個話語體系交互作用之下，有關「中國婦女」的論述再次成為討論其他問題時候的符號。對於芸芸眾生實際存在的「中國婦女」而言，這個「真好」因為運作在歷史邏輯所提供的有限選擇中，這個立場所反映的既是一個思維的圈套，也是一種話語的困境。

中國婦女所面臨的社會處境包含男女性別上的差異，也包含其中的不平等。然而長久以來男女之間的「不同」與「不平等」，無論在語言運作中或結構制度上，卻往往由二而一，交織成思維習慣中難以分殊的一體。簡言之，大家習以為常的是只要有不同，就該有不平等。

有關中國婦女的議題，在 20 世紀中隨著國民的改造及戰爭、革命的動員，成為中國現代化轉型歷史敘述中重要的項目。近年大規模群眾組織抗議性的社會運動在意識形態中已不再時髦，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中不存在各種值得抗爭的問題。自由主義、反殖民主義這些源自 19 世紀歐洲近代史的話語系統，作為知識上的工具，似乎走到了資源枯竭的地步，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文化中「古已有之」、「天經地義」的萬事萬物，沒有值得重加評估再作批判或反思的餘地。

今天我們論述有關中國婦女的各種議題，如何自革命及殖民話語的運作邏輯中解放出來？如何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描述語言？我們如何看待婦女

的不同，如何認知其中的不平等？當中國的婦女抵抗不平的待遇但卻無懼於與人不同的時候，中國的歷史及文化資源對這樣的發展能提供多少的資源或阻力？中國婦女的自我實現可以不附庸或依傍在民族國家等大題目之下嗎？今日婦女的自我實現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改變傳統習見的中國？外來世界的參與在這一個過程中發揮了哪些作用？在中國作個女人也許誠然真好，然而這個「真好」如何避免成為歷史邏輯下的圈套，以及話語運作中的盲點？如何跨出這個邏輯以及打破這個盲點，我想這是我們進行有關中國婦女歷史研討所共同深切關心的問題。